

坎坷道路上的足迹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文
艺工作者同去北京参加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许杰 口述
柯平凭 撰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许杰

责任编辑 姜汉椿

装帧设计 柯平凭

坎坷道路上的足迹

许杰 口述 柯平凭 撰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2,000 本

ISBN 7-5617-1691-5/I·157

定价 18.60 元

序

我非常敬重许杰先生。我在内心是一直把他当作自己很亲近的父辈的。在他生前，我常到他家里去，传递从系里信箱取来的一本书、一封信之类，有时没有什么事，就只是去看望看望他，问问他身体可好。许先生是一位蔼然长者，和颜悦色，缓缓地讲话。陪他坐着，感受到一种宁静气氛。我告辞时，他总要站起来送出房间，再送到住所总门外，在楼梯口站定，向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辈，含笑道别。后来许先生年龄越来越大，走得颤颤巍巍的，然还是一脸笑容，笑容里仍然透出宁静。我从他的住所出来，常常会感动于这种宁静。但是我说不出这种宁静所自来，也说不出它后面的意味，只觉得吸引我。

现在，我读完了许先生这本口述自传的清样，我想我对他的了解是多一点了。这位知识者中的世纪同龄人，这位文学界的五四老人，在这里讲了他自己的长长的故事。他平静地随着时间的流驶，说得平平淡淡，有的地方好象还有点罗嗦，而没有一点装点，甚至连可能会使有的读者小看他的彼时彼地的内心想法，都不回避、遮掩，原汁原味，和盘托出，给我们展示出历史（包括他的心史）的“原生态”，和他自己的原有面貌。

许先生的一生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大时代，使中国许多平凡而正直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这个过程是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易于理解。尤其是许先生以他率真、平实的态度娓娓说来，我们这

种感受就特别深。许先生诞生在浙东山乡一个镇上的贫困人家，读中等师范，当小学教师，连大学也没有读过。贫穷艰难的童年生活是他的第一位导师，这位伟大导师的代言人之一是他童养媳出身的母亲，母亲教导他“穷要穷得清白，做人要有志气”。这是一份菲薄的却十分可贵的精神财产，它是用之不尽的。许先生以它为底子，走上漫长的坎坷道路。以它为底子，许先生一开始就自觉地接受五四高潮的洗礼，立志寻找社会解放的道路，实现人生的价值。所能碰上的周围的人宣传无政府主义，他觉得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最正确、高尚，就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因为事实的教训和眼界的扩大，明白共产主义才是真理，又从善如流，信仰共产主义。没有一点矫揉，没有一点勉强。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他也随着时代，随着新文学的创始者们，摸索，试练。那个时代要求文学与社会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能为改造社会尽一分力，许先生也就努力“用作品参加社会运动”，去“影响社会”，创作了《惨雾》等现实主义的力作；而在写城市知识分子生活时，感到光是现实主义方法不足以表现，就又尝试融入一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手法，一点也不固执、僵化。在理论上，为了追随时代，“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1927年，许先生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名之曰“明日的文学”，旗帜鲜明。不久，迫于生计，远赴吉隆坡主编《益群日报》，又在南洋这片异邦土地上提倡“新兴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荒凉的“枯岛”上播撒新文学的种子，为那里的华侨呼喊他们的心声，为此与英国殖民者管制的政府当局的压迫抗争，而不怕打破饭碗，多次受到“训斥”而在所不顾。抗战时期，许先生在浙江、福建一带教书，奋力倡导“东南文艺运动”，召唤作家“如实地写出抗战时期人民大众的生活”，在这里发扬了五四战斗传统，使得新文学在此时此地没有

留下空白。到了解放战争，许先生非常振奋，心上充满了赶了解新时代、深入新生活的热情和紧迫感，这种心情，在当时写作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铸炼》生动地流露出来。现在有的年轻人，不大理解为什么五四以来不少知识分子渐渐都信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什么热心于提倡左翼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使命，有的还以为是由于偏执，因为矫情。如果他们读一读这本书，他们会明白，这实在是出于必然。正直的、血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大都会走这条路，尤其是出身贫寒、或是对下层人民的痛苦和愿望有所了解的中小知识分子们。

从五四高潮到新中国建立，许先生好象始终不在政治和文学新潮的中心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正因为早于“革命文学”论争，不是在主要阵地上举起这面旗帜，所以当时也没有引起“轰动效应”。这都是在于机缘。许先生“无所谓”。许先生珍惜的是他在这个大时代里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他珍惜的是伟大平民的母亲“清白”和“有志”的教导，他珍惜的是人生的真正的价值。而这是可以自己把握的。建国后，许先生倒引起过轰动。那是1957年，他的一以贯之的希望积极影响社会的热情，和率真的本性，使他不合时宜地向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结果当时这位年近六旬白发苍苍的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成了“大右派”，罪名遍播上海，以至全国。本书没有写他建国后的生活。他说他原本是竭力要忘记那些的，现在何必再写？从别人有的回忆文章看，那种罪名套在头上，许先生是很痛苦的，但他并非痛不欲生，过后就让自己忘记。也许他认为人生的路本多坎坷，是非臧否又并非定于一尊；也许他对于茫茫宇宙、悠悠古今别有一种感悟。总之，他觉

得那些也“无所谓”。这样,许先生总是宁静的。

许先生的宁静后面,是五四老人牢固的信念和他的浙东人的“硬气”。五四人物的信念,包括社会总会走向光明的社会信念,和对社会有益人生才有价值的人生信念。这里的社会信念使他心胸宽广,这里的人生信念使他忘怀得失。这整个的信念许先生没有哪一时抛弃过,直到九十高龄仍在写作,仍然本着五四精神,针对当前弊病,呼喊“模拉尔”(道德)姑娘到来。陶渊明曾用别号五柳先生为自己作“传”,说他是“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我看如果改两个字,以况许先生晚年,也很贴切,那就是“常著文章警世,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陶渊明是出世的隐士,许先生是坚韧的战士,但因实现着自己的志向而心理宁静,却是一样的。“硬气”也是宁静的“后方”。“硬气”总是使许先生不折不弯,直道而行,因而遇事之后,不受良心的责备,无怨无悔。

但是许先生在逝世前的两、三年里,有点失去宁静。这在收入本书的《一个九一老人的生活和思想》一文中有所流露。许先生说他 86 年光荣离休,工资提一级成为一级教授,领受之后觉得不安,说自己已“没有具体的工作和应负的责任,总是觉得空虚和失去了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一纸离休证书不是引起他安享晚年的欣慰,也没有触发他遭受磨难丧失二十余年工作时间的牢骚,而是激起他要用新的工作来报答国家和继续追求理想却难有机会的伤感。许玄的《安息吧,疲倦的老牛》一文还清楚地描述许先生最后两、三年的有失宁静。这篇文章说,许先生这时两腿酸软,目力不济,很难写作。他感叹衰老,因力不从心而非常焦躁。许先生,他身上实际上仍象青年一样热血奔流,心里仍然涌动着五四时代的责任感、理想和目标,但是已没有力气去实

践,于是就难以宁静。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许先生是人之将死,其心难平。意识到这一点,我曾怅然良久。宁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气氛,是一种高贵的态度,是一种美的境界,是人可以创造的。但是自然的力量有时更强大,它可以阻止,破坏。这就是人生的难以避免的悲剧性之所在吗?

最后我想说,许先生的小说创作、文学主张和道德、品格,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评价。但想到许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的一贯态度,立时胸中豁然。收在本书前面的《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中,许先生自己不是说吗,“自己已到了这把年纪,好丑毁誉,都无所谓。”这就是了。

柯平凭同志为许先生辛苦记录,悉心整理,态度忠实,理解也颇深,我们读者是应当感谢他的。他再三要我为本书作序,我实在是不配的。推辞再三,终于写了上面这些,也算不得序,只是表达了一个学生对许先生的思念和敬佩,不过有这个机会来表达这种心情,我是很高兴的。

王铁仙

一九九七年五月

且说说我自己

许 杰

前些日子,《收获》杂志的编辑同志来信向我约稿,说是他们新辟了一个栏目,叫做“人生采访”,邀约一些教授、作家写稿,且说说自己。我当时想,这题目并不难。我已是八十九岁的老人,半生的经历与遭际,都可写它几千字的,决不会交白卷。过了几天,我碰到钱谷融同志,才知他已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而且,这个征文的标题,还是他起的。据他所知,贾植芳、施蛰存等也已经约定写这样的文章。我想,这该是杂志编者组稿的好方法,但却把写文章的人,当作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怂恿他们上擂台打擂,用来娱乐观众,吸引看客。好在自己已到了这把年纪,好丑毁誉,都也无所谓。写出蹩脚的东西,那又何妨呢?

可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不能安下心来提笔。我也想先看看钱谷融他们写的文章,觉得拖些时候,也不要紧。哪里知道,有一位远在西安的从未见过面的同志,他却关心着我,并且为我复印寄来我在1948年年底写的旧稿。接着,等我给他作了答复,他在第二次来信中,问我关于《收获》的约稿,是否已经写就?我想这位同志,他远在西安,都知道这样的信息,我是应该赶快提笔,完成这任务才好。正好这时,《收获》的编者,知道我想先看看前面

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他们又把今年《收获》的二、三、四期，一齐都寄来了。我非常的感谢编辑同志，因为他给我提供这些好资料。同时，我也感谢这几位先行的作者，似乎他们也在催促我赶快写作，赶快交卷。这就促使我有提笔的勇气。

二

这里的题目是“且说说我自己”，但我又将说什么呢？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这个人，似乎重新被人知道了。因为在这以前的二十年里，我的生命，几乎也成为“空白”，没有人关心你的出身、身世与经历。“三中全会”以后，徐州师范学院开始发起约稿，要编一本《中国现代作家传略》，我庆幸有这机会，当然写了文章，那题目就是《关于我自己》。其后，他们又把这部稿子交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我现在放在书架上的厚厚两大本。另外，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也收编我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走过的路”，也是自我介绍或自传式的东西。至于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则完全是我一生的回忆录。这篇文章在该杂志上连续刊载了好几年，但还只是写到全国解放为止，全国解放以后就没有写下去。这原因不知是什么。我总觉得，解放以后的日子，生活过得过份紧张，对于精神，包括肉体的刺激比较厉害，好像要努力“忘却”似的，所以老是回忆不起来。

我想这些文章，即是我过去写的有关我自己的东西，都可以包括“且说说我自己”这个题目之内的，我得在这里提一提。我现在想要说的，是我自己眼前的生活现状，特别是我的内心世界，是我的内心世界终日纠缠在心头，而且自己觉得内疚的一部份。

三

我今年已经八十九岁了，照一般的习俗，说是“做九不做十”，八十九岁是可以做九十寿的。这事虽然落俗，而且有点近于虚假、炫耀，要是认真起来，说几句挖苦或讽刺的话，都无所不可；但一般的习俗如此，我家里的子女媳婿，以及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同事和过去的学生都主张要搞搞这个仪式。那么，从内心说，我还是乐意的。

就在这9月16日那一天，华东师大中文系，为我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名义是庆祝我的九十寿辰及从事教学创作七十周年。这会由中文系主任齐森华主持，师大校长袁运开和党委副书记吴铎，都分别说了话。来宾当中，有徐中玉代表上海作协、陆诒代表上海市民盟市委，致了贺词。我过去教过书的暨南大学上海暨大校友会，立达学园校友组织的立达学会都派了代表来参加。朋友当中，王元化，王西彦，也都先后讲了话。复旦的濮之珍，她还声明代表她的爱人蒋孔阳；上海师大的朱雯，说他与他的夫人分了工，要他夫人罗洪同志到我家里来祝贺，而他这次来，却仍旧是代表他和他的夫人。在我过去几十年的教书生活当中，听过我的课的，现在已经成了学者专家，也不在少数。当然，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但我这个当过老师的，却时常以给人哺过奶的奶妈自喻，说是吃过我的奶的青年，他们日后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我这个奶妈，也分润了几分光荣。可巧，这一次的来宾中，有曾任复旦中文系主任的胡裕树，他就曾经听过我的课。而成了国际有名的学者，到外国去讲过学的章培恒，他非但在复旦读书时听过我的课，而且，据他自己对我说，在中学读书时，他也是我的学生。他们两个人，都在这次庆祝会上讲了话。人非木石，

我这老到八十九岁的老人，耳朵还能听清，脑子还能运思、设想。在他们每一位同志发言讲话的时候，我总是跟着他们所提到的往事，展开自己的回忆与想象。自然，这些都使我很觉激动，也很是庆幸与安慰。几十年来的事，他们说到的，一些我也记得起；有一些，我却完全不记得了，但他们却是这样明白地提了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又怎能不激动，而且感到快乐与安慰呢？

另外，还有些亲朋送来礼品和贺电，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托人代办的一个大花篮，以及中文系送的红木雕的案头摆设老黄牛，更令人喜爱感动。其余就不去说它了。

四

今年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七十周年纪念，又是建国四十周年，在那一个时代气息的激荡中，我的思想精神，却也有些感奋。还在4月期间，《文学报》的记者，就前来向我约稿。我想起自己这七十年的生活，“五四运动”乃是自己新生与作人的开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自己发现一点自我意识，知道应该怎样做。多少年来，凡是逢到“五四”，总有些新的感受，或写一点纪念短文，或是在课堂上趁机说说“五四”精神的伟大意义，甚至有时还去作一次演讲。只是，在解放以后——特别是五七年以后，我却默然不响，形成一大段“生命的空白”。直到粉碎“四人帮”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开始复苏。记得1979年的“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五四”六十周年纪念会，我写了一篇《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这篇文章在当年的《学术月刊》上发表），前去参加。在那篇文章中，我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极“左”思潮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我以王任叔之死的实例，说明这个极“左”思潮，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所犯下的罪行。如今，又过了十年，在这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是不能没有话说的。所以，我就应了《文学报》记者的邀请，写了一篇《一个过来人的纪念》。

谁知也正在这先后，陕西的那位相识的同志，——他的名字叫钟朋，复印寄来我在四八年年底写的一篇短文。承他的好意，说是我没有把它收入散文选或《冬至集文》的小册子里面，可能是遗忘了的。我看见这篇文章，原来是为迎接1949年春天的到来，为《文艺春秋》的“新春随笔”专栏而写的，题目就叫“面对着新的现实”，是立足现在，展望将来的意思。我重新看过这篇文章，自己心中，也不免有许多感慨。我在这篇文章中，最后曾说了这样的话：

1949年的开始，也是人类的春天的开始。但是，战胜寒冬，创造光辉灿烂的春的世界，却不仅是一句空话、一个希望呵！他是要凭着更多的人民的努力的。我希望把我自己这一点微细的生命的力，投入这人民的力量的大海之中。

可是，解放以后，我自以为是把自己的力量，投入人民力量的大海之中的。谁知天差地错，到了57年以后，我被挤到人民力量的反面，以至成了无用之人——空虚的存活，创造了一大段“生命的空白”。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与咀嚼，1956年，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我以一个非党人士的资格，参加上海的代表团，到北京去出席会议。当时同去的就有姚文元、张春桥，以及后来也成为“右派”的傅雷。我是何等虔诚地聆听毛主席的讲话——我是如同用功的小学生一般抢着第一排的座位，听毛主席

讲话。这篇讲话就是以后整理出来发表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回来以后，我真心要积极帮助党整风，发动非党群众，向学校党委提意见。毛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党提意见，只要百分之五是对的，百分之九十五是错的也不要紧”吗？因此，我就以积极态度，领导师大中文系向党委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谁知一阵风来，我却立刻成了右派。在这以后，我虽然内心有些想不通，但也听了别人的劝告，总是“低头认罪”的好。过了两年，我算是改造好了的一个，在59年的国庆前夕，摘了“右派分子”帽子。可是以后呢，我只是成为“摘帽右派”，一切的待遇，一点也没有改正。比方，我当时的教授头衔革除了，系主任的职务取消了，工资降低了三级，但在宣布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这些待遇，却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当然，我那个时候的思想虽然有点不通，但如果提出这种要求，不就是为名、为利，你的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不是还没有改造好吗？就是这样，一直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当时自笑，这是“回收的废品”，才给我恢复教授的职称、恢复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至于系主任这职务呢，却是没有下文，我也不便多说。我早已心满意足了。后来，我这“回收”的教授，也带过一届硕士研究生，重新入了党，后来又离休了。这在一般情形来说，我是应该“乐其天年”的了。

五

近几年来，我自己对于平静的心境，也有一些认识上的进步。还是在去年的年底吧，台湾《联合日报》副刊的编辑，通过香港友人的联系，来信向我约稿。说要趁这1989年新春来临之际，组织一批海峡两岸的作家，“隔海拜年”。我也寄了文章去了。记得许多大陆的作家，如柯灵、王西彦以及端木蕻良等，都有作品

寄去。我在我的文章中,首先提到我自己近年的思想情况,也可以说是忧乐观吧。我说,这几年来,我时常套用《论语》里孔老夫子的两句话,我把“父母之年”的“父母”二字,换作了“自己”,这就成为“自己之年,不可不知也。”接下去的两句是,仍旧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想到自己早已过了八十岁的大半,正向九十迈进,自己难道不应知道吗?当然,活到这把年纪,自己知道了,记得了,而且引以为炫耀的意思,这难道不高兴吗?这自然是“一则以喜”的理由。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你再过一年,再大一岁,却也在走近了死的边沿一步,靠近死的境界更近的一年,依孔老夫子的想法,不就同是可怕的事吗?这就是“一则以惧”的依据,自然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可是,我在去年写那“隔海拜年”的文章时,自己却似乎有新的触发,新的认识,我竟然把这“一则以惧”的话,改作“二则不惧”。这就成了“自己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二则不惧”了。我自己想我的许多从小要好的同学或朋友,他们早已做了古人,而我自己,至今却还活着。鲁迅先生五十六岁死的,孔老夫子也只有七十二岁。比起他们来,我可活得够长了。何况从事业与对社会的贡献说,我这活着的人,不也等于“白活”?所以,一个活到这把年纪的老人,高兴也来不及,就是一旦死神来临,又有什么可怕呢?这就是我最近几年的思想心境。

但是,我现在是在向知心的朋友“交心”,我要说说我自己心里的话,说自己心里隐藏着却又老是纠缠着我,使我觉得内疚,觉得老是对不起人的话。这种心情,我是已经到非说不可,“不吐不快”的程度了。我又何不趁此机会给它说出来呢?

原来,我这写过几十篇文章、教过几十年书的老知识分子,在过去的社会里,也曾被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的。就在上海解放

以前的年月里，我有几个朋友，也有我的学生，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做事。其中的一位，叫袁重山，是国民党部队里一名少校军医，他在国民党决定要撤退到台湾去的时候，跑来和我商量，问我应不应该跟着部队走。我当时是一口劝阻他：“你不要去，你去做什么哪？”这就把他的去志打消了。他相信了我的说话，留下来了。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叫金炤华，我的一个学生叫潘泽上，他们都同袁重山一样，先后来和我商量，他们都因为我的劝阻而留下来了。

可是，解放以后不久，他们都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我的学生潘泽上，他是安徽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国民党要撤退时，他是什么空军司令部的英文秘书，手里掌握着一些文件资料，也可能有些统计数字。他当时真是诚心向着共产党，希望能在他的可能范围以内，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他偷偷搞了一份复印文件，让原件由他们机关带到台湾去。可是，当他把这些文件，交给我们的接收人员时，他们却说他是国民党有意潜留下来的特务。

提起袁重山，他原是我小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他第一，我第二。其后他在南通医学院毕业，开始是自己挂牌在家乡做医生。他参加了共产党，后来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关在监牢里。他的小脚女人，到处给他奔走，总算给予保释出来，但保证不许再干党的工作。正好他有南通医学院毕业的同学，在陈诚部下的部队里当军医，很取得陈诚的信任，所以就把他介绍到什么军的部队里，也当了军医。在上海还未解放以前，他的陆军部队，我的学生潘泽上所在的空军部队，当时都在虹口公园前面、日本军队在上海留下来的港口司令部办公。但他们却是各不相识的。袁重山到肃清反革命的时候，被说成是共产党的叛徒，又是国民党留下

来的特务，关押起来。过了几年，又由他的小脚夫人，东奔西走的保释出来。以后，再过几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重新捉去坐牢，受尽了精神与身体的折磨，终于死在监牢里了。

还有一位朋友金韶华，是一位研究水产的专家，他留学日本，曾经当过舟山水产学校的校长。抗战时候，他到了重庆，因为一位国民党军需署署长陈良是我们同乡，金韶华就在他下面当一名粮秣厂厂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住家，我们时有来往。解放以后，有人知道他是水产专家，对他很表信任。记得解放初期，华东的什么单位，就在当年的中苏友好大厦开过一次华东水产展览会。当时我也去看过，规模很大，深得好评，听说都是他的策划。其后，水产部迁到北京，他也到了北京，仍旧在水产部工作。可是，到了肃反运动开展，他是国民党旧职人员，这就成了肃反和专政的对象。开始是在北京，受到地区里弄的监督，在马路上扫街，其后，又押解回到原籍，由当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后来，由于查不出什么具体的罪行，给释放出来了。但却由于生活，到处奔走，终于因为一次不注意的小病而死去了。至于我的学生潘泽上，至今还健在，可他在精神与生活上，也受尽折磨。我这次生日，我也约他前来参加。他当面和我谈起，老婆已死，儿子媳妇对他并不尊敬，已经分居。他自己是孤老一个，生活过得有些凄苦伶仃。虽然他自己对我表白，说是对这些遭遇毫无怨言，但是，我的内心始终是不安的。还不止已经死去的老朋友袁重山、金韶华，也不仅是现在还健在的潘泽上。我想到我自己由于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以至无端的影响到别人一生的幸福与命运，成为我终日在心中觉得内疚不已的还有两位同志呢！

对于这两位青年同志，半生所带来的不幸，要说是我的责任、我的缘故，又好像“不是的”；但要说他们所遭受的不幸，完全

同我无关吧，却又的确是由于对我的信任而引起的。所以，在理论上、在外表上，我可以丝毫不负责任。但在我的心里，我的良心在责备自己，他们自己半生的受苦，他们的父母妻子的辛酸命运，却是由于我之成了“右派”才决定的。这是事实，我又怎能不从心底里发出对他们的抱憾呢！这也是日夜揪心的、心头觉得内疚的事呵！

这里要说的，首先是曹鸿梁。57年反右时候，他是一个华东师大毕业留下来作助教的青年教师。他平时学习努力，思想进步，是师大中文系青年教师的团总支书记。当他听到许杰将要被划为“右派”时，就挺身而出，拍胸口担保。他说：“许杰不是右派，我愿以团籍担保！”哪里知道，这阵大风来了，他这个青年教师团总支书记，不但担保不住许杰之非“右派”，就是他这个响当当拍胸口的团总支书记，自己也成了“右派”。经过了两年，他也改造得很好。在59年的国庆前夕，同我一同第一批摘了“右派”帽子。自然，这应该是好事，可那时的领导，仍旧有点过“左”思想，正好江西大学开办，借着支援江大的名义，就把他送到江西去了。谁知到了江大，他们从个人档案上看到，这是“摘帽右派”，就另眼对待。因此，借着几次运动及学习的名义，他先从江大被下放到一个中学，而后，又从这个中学，被下放到江西的边远地区，远到广东边界地方的小学里去了。你能说，这不是精神上的折磨吗？

谁知正在这个时候，他老家的母亲，早已患瘫痪症，而他老婆，却在一次大雨时抢着负米过河，大水冲坏了板桥，连人连背上所背的米，一齐给大水冲走了。你能说，这不是个人的悲剧吗？当然，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幸命运而怪我。但你能知道，我在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里又能发生一些什么感受呢？！

其次，还有一个杨万才，他所遭际的困厄，却是更惨了。推其